

戒掉土地财政是城镇化吸引民资的关键

郭文婧 自由撰稿人

3月20日,财政部网站刊登的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的讲话称,预计2020年城镇化率将达到60%,由此带来的投资需求约为42万亿元。如果有政策支持和经验总结,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将成为城镇化资金来源的重要渠道,可能更多资金来自社会投资,能有效减轻政府债务压力。(3月21日《每日经济新闻》)

王保安是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培训班上讲这番话的,政府与私人组织之间合作建设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的PPP模式,确实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但PPP模式在我国推广的难点,除了没有法律法

规、政府还不够专业之外,更大困境是,目前大多数城市政府的财政都高度依赖土地,“投资靠土地财政,融资靠贷款举债,偿债靠土地担保”,政府没有健康可持续的财力保证,也就导致了政府在PPP模式中的信用缺陷,必然让民资高度警惕。

将高达42万亿的投资需求,主要寄托在民资上,显然思路是正确的。一方面,上一次政府4万亿投资的后遗症还没完全消除,如果继续以政府为主投资,就会进一步增大我国经济的系统风险;另一方面,现在民资富余,截至2013年11月末,我国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高达102.7万亿元,仅个人存款就高达45.2万亿元,而民资投资渠道不物也是不争的事实。新型城镇化建设,主

要依靠民资,不仅能实现双赢,还会极大提升我国经济的活力。

然而,资本都是趋利的,政府可以不计效益,民资就要盘算能否赚钱。如果不能解决民资的回报问题,无论什么模式,无论怎么提倡和鼓励,可能作用都非常有限。传统依赖土地财政解决城市化资金缺口,结果导致地产和金融泡沫扩大,不仅让城镇化的成本直线上升,而且导致对产业和人口的吸引力下降,不仅一些新城成了“鬼城”,而且一些传统城镇也出现了“空心化”危机。这种情况下,民资显然是不愿也不敢积极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

新型城镇化建设,日韩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是有现成经验的,那就是用土地开发的财

务平衡替代土地财政。政府不能想着靠土地拍卖赚钱,政府所征的地,除了解决底线基础设施和解决人的城市化之外,都不能拍卖,而是要用来做保障房,用来扶持实体经济。土地开发的财务平衡避免了“造城、扩城陷阱”,降低了实体经济投资的成本,民资的积极性自然就高了。这样的城市化路径,也就顺利实现了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由“乡”到“城”的转变。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新型城镇化建设,也必须遵循市场规律,不可急着手人为造城。但是,如果政府的土地财政模式不变,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路径就依然难以改变,所谓的PPP模式也只是融资方式

的变化而已,本质上仍是“铺摊子、做煎饼”,民资对所谓充满暴利的房地产都要三思,更不必说其它了,这恰恰就是王保安副部长说很多项目在重复地“交学费”的原因所在。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将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并称为“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两件大事”。美国的高科技发展,核心的就是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但政府必须定好位,不能用行政手段替代市场规律。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具体进程和方向,也必须顺应市场规律。民资本身就是市场要素,要吸引民资积极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就更应该尊重和顺应市场规律,而土地财政本身就是导致资源错配的重要原因之一。

土地财政不改变 平度悲剧难终结

一叶 职员

3月21日的一场火灾,导致青岛平度市杜家疃村村民1人死亡,3人受伤。事件由当地征地纠纷引起,是否涉及非法征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当地国土部门称,此次涉及地块早在06、07年就已经完成了土地性质的变更,而当地村民称对此并不知情,杜家疃村原文书李荣茂称,当地政府通过伪造村民签名、手印等手段获取审批通过。(3月24日《潇湘晨报》)

山东平度村民耿福林等人,因不满政府征地政策,在争议土地外搭起帐篷抗议,却遭离奇火灾,耿福林被烧死。李荣楠、李德连、杜勇军不同程度被烧伤。当地警方称,经公安机关侦查,发现有纵火嫌疑,目前正在全力侦破。

对于世代代与土地相依为命的农民来说,土地无疑是他们的立命之本。事实也是如此,杜家疃村村民之所以不同意征收这120多亩的农用地,一是认为被征土地没有合法手

续,属于违法征收,二是给村民的补偿款太少,让失地村民为今后的生活顾虑重重。

人们不禁要问:杜家疃村的干部胆子咋这么大,敢于伪造村民们的签名和手印?据人民日报官方微博报道,平度官方资料显示,125亩地总共补给村民944万,而卖给开发商1亩就123万。村民拿到的补贴只是土地实际收益的一个零头。23日凌晨,平度市委宣传部长官方微博承认,开发商存在“少批多占”的情况。这与此前平度国土局声称的手续合法自相矛盾。

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全国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余额达3.85万亿元。有多个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达到了国际警戒线。面对巨额债务,市人们显得非常淡定。中西部某城市的市长给《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算了一笔账:“拿我们重点建设的某个城市新区来说,现在那里的地卖50万1亩,但是整个基础设施上去了,价格就是1000万1亩。你说我举债,给我五年时间,那边配套跟城区一样成熟,我投几

百亿下去,1000个亿回来了。”

透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地方政府有卖地的政绩冲动,不法开发商与地方政府相互勾结,甚至不惜伪造村民签字、手印,与民争利,是“平度血案”的罪魁祸首。

土地财政是不顾子孙后代、杀鸡取卵式的短期行为,贻害无穷。土地财政不仅从客观上推高了土地价格,使各地“地王”频出,也使房价屡创新高,使国家对房价的宏观调控屡屡落空。屡创新高的房价,让老百姓怨声载道,也让整个国家的经济被房地产绑架的风险日益加大。

土地资源是有限的,耕地资源更为有限。地方政府靠卖地过日子,终非长久之计。有数据显示,我国现有耕地约18.28亿亩,18亿耕地红线岌岌可危。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可卖的耕地即将告罄。面对保增长、促就业的诉求,地方政府面临着经济发展的巨大压力,各级地方政府要尽快摆脱对土地财政的过分依赖,加快经济转型升级。

面粉“增筋剂”再证标准风险之患

堂吉伟德 职员

2月中旬,赛百味美国被曝光面包制品中含有一种名为偶氮甲酰胺(ADA)的工业发泡剂,引发媒体关注,该成分同样添加于鞋底当中。而就在不久之前,赛百味中国声明称,中国食品中并不含有这一成分。之后星巴克中国承认,在华出售面包制品中含有偶氮甲酰胺成分,但表示这一食品添加剂符合中国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新京报》3月26日)

从否认到承认,再以符合中国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作答,“赛百味中国”的表现让人无奈。在国内最新修订版的《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里,“偶氮甲酰胺”作为一种合法的添加剂被允许使用,因而赛百味的解释并非狡辩。然而,允许添加是一回事,如何添加又是另一回事,食品添加剂除了非法添加之外,还有滥用的风险。

相比于非法添加的明确化,滥用却很难被发现并最终得出结论。很多添加剂被证明具有毒性,即便在所谓的“安全剂量范围之内”,累积下来依然有安全风险。以偶氮甲酰胺为例,正如国家粮食局标准质量中心原高级工程师谢华民所说,虽然“偶氮甲酰胺”的毒性目前无法精确测定,但偶氮类化学物质都具有一定的致癌性。国家虽有安全剂量标准,但偶氮甲酰胺在使用中无法检测具体用量。因而,从绝对的安全性来说,凡是对人

体有害而无一益的添加剂,都应慎用甚至禁用。

也正是因为如此,除了北美等少数国家和中国之外,欧日等大多数国家都严格禁用偶氮甲酰胺作为食品添加剂。一方面是基于这种物质本身的有毒性,另一方面则是对不明确风险的绝对防控。因为使用过程的标准超标,几乎很难实现有效的监管。而从现实来看,食品添加剂滥用比非法添加更加难以控制。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应有两个基本的原则,一是食用安全性,二是技术必要性。一般来说,能尽量少用的就不多用,能尽量不用的就不支持,要严格禁止的就不能开口子。相比较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国内食品安全最大差距,就在于标准过低导致的管理滞后。

面粉“增筋剂”之患再证底线风险。意即在制定标准时,应当对可能出现的风险都考虑在内,而不应有侥幸心理。“安全范围”那只是技术层面的设计,在实际中并非能够真正得到有效执行。有的时候,技术需要只是一个方面,安全性才是最底线的标准,只要对健康可能带来隐患的东西,都应当坚决禁用,或者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使用。若是安全标准本身都心存侥幸,那么商家的自律也就基本不可靠。洋品牌在国内外的不同表现,表面上是道德出现了问题,其实是食品安全标准存在着过大差距。

戏画闲言

环评造假 贪官奸商俱惩办

吴之如·文并画

《法制日报》报道,江苏省宜兴市4名乡镇干部,收受环评中介机构贿赂,造成市场不正当竞争,被法院以受贿罪分别判处3至5年有期徒刑。如果环评存在弄虚作假的行为,那么,一些污染项目就会顺利过关,就会披着合法的外衣污染环境,损害百姓的健康。

有些地方为什么能让污染企业长期落户藏身,躲过相关部门的环保督查?说到底,不过是当地某些干部因为自身利益驱使,因而敢于违反国家的环保国策,违背当地百姓的正当权益和长远利益,利用职权收受了大笔贿赂后,将一些污染严重的企业“招商”进门,更在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弄虚作假,使其轻松通过环评。他们贪欲膨胀,以权谋钱,引狼入室,充当环境污染的保护伞,受到法

律严惩,正是理所当然之事,饱受环境污染之害的民众自然会拍手称快。有道是:

环评造假靠行贿,污染恶魔紧相随;贪官奸商俱惩办,蓝天清水得回归。

值得注意的是,环评机构本该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本着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职业道德,对项目进行环境影响的客观准确评价。但是,在实际环评中却屡屡出现相关人员在行贿受贿后刻意掩盖严重污染环境的的可能,随意为污染项目出具可行性论证的现象,不能不说是腐败恶习无孔不入的恶果。

看来,在强调各级政府公职队伍恪守各项制度的同时,有必要动员并依靠公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强大社会力量,堵上腐朽意识和腐败势力造成的种种漏洞,使防治环境污染的努力在反腐败斗争的强大背景下取得更大的实效。



“跛足”城镇化背后的角色错位

吴江 自由撰稿人

3月16日,各方期待已久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下称“规划”)正式对外发布。规划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副司长陈亚军认为,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是对城镇化的正本清源。“农民工不仅是生产者,还是生活者。我们不但要给农民工提供就业,还要让他们能在城市里面体面地生活下来,让他们能享受和市民一样的基本公共服务。这也是规划的最大亮点。”此外,城市公共建设、环境资源的集约式发展都将带来地方公共支出的增加。上述多次参与规划讨论的人士表示,地方政府不愿承担城镇化带来的公共成本,这是城镇化规划制定和推行的现实阻力。(《中国经济周刊》3月25日)

城镇化之所以能如雨后春笋般迅速生长,地方政府其实功不可没。一直以来,地方政府几乎从不掩饰对城镇化的热情,而城镇化更是被视作地方经济发展最有力的引擎,地方政府与城镇化之间的亲密无间,地方政府在城镇化方面的不遗余力,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既然如此,说地方政府不愿承担城镇化带来的公共成本,甚至认为这成了推行城镇化的现实阻

力,似乎多少显得冤枉。

不可否认,假如把城镇化简单的与新城的拔地而起,甚至建设开发的火爆场景划等号,那么,地方政府在其中的扮扮演着“关键先生”的角色。无论是在规划、审批环节的强力支持,还是对城镇化进程中各方资源与利益的协调,地方政府无疑是城镇化这幕大戏背后真正的总导演。如果缺了总导演,即便各路演员是怎样的“名角”,其实都玩不转。而作为“导演”,当然没有想把戏给演砸的,为了戏能出彩,倒是少不了要殚精竭虑,废寝忘食。从这个角度来看,地方政府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关键角色,当然不容低估。假如把“总导演”诬为“砸场子的”,倒实在是看走了眼。

不过,新城规划、建设开发,固然是城镇化进程中绕不过的环节。但是,城镇化的真正内涵显然远不止于此。不仅如此,当城镇化被过度聚焦于建设开发及其背后的经济账本时,恐怕已是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走得太远,以至于忘却了出发的目的。现实中,城镇化开发却建出空城,甚至鬼城,正是明证。

而与城镇化建设开发环节的火热朝天相对应的,则是城镇化公共服务短板的日益凸显。且不说拔地而起的新城,大多

只见开发,却难见公共配套,商业化建设,地产开发火爆的背后,公共交通却不见踪影,医疗与教育等必备的公共服务更是遥不可及。而后者恰恰才是城镇化的内涵和关键所在,才是政府在城镇化进程中必须坚守并担当的本位角色。

正所谓“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同样不应角色错乱。城镇化的商业开发与建设环节,理应交给市场,而不是地方政府撸起袖子自己上场,即便是以建立地方开发平台和公司的方式从中牟取利益,同样涉嫌越位;而在城镇化的公共服务配套与供给方面,政府恰恰责无旁贷,承担城镇化带来的公共成本,显然不是情不情愿的问题,在公共服务方面的失位,其更应建立相应的行政问责与追究机制。

不难看出,建设开发热,公共服务冷,“跛足”的城镇化,骨子里其实缘于地方政府角色的错位。当本该由政府站稳的公共服务这条腿,却更有兴致插足于商业性开发那条腿,如此城镇化,注定将难以平稳前行。而唯有地方政府退出城镇化开发的名利场,回归担当城镇化公共成本这一本职,城镇化才不会陷入“只见城,不见人”的尴尬境地。

经济洼地该怎样“弯道超车”

叶雷 自由职业者

长时期以来,一些经济“洼地”说到优势,习惯于强调“后发”;说到期盼,习惯于用“跨越发展”与“弯道超车”来表达。但纵览世界各国与地区,并不是所有具有“后发优势”的国家和地区,都能够成功实现“跨越发展”并最终“弯道超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往往都是沿着先发国家和地区所走过的正确路径和轨迹进行追赶,所以总是存在“最后最小差距”,难以实现真正的“超车”。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这是我国成功实现“跨越发展”与“弯道超车”的必然要求,也是对国内一些经济“洼地”的要求。对这些经济“洼地”来说,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经济发展都应该以改革统揽全局,以改革创新开局,用改革增动力促发展,向改革要红利惠民,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步伐,把经济增长稳在合理区间,从而成为成功“跨越发展”并最终“弯道超车”夯实基础。

要充分发挥经济“洼地”的“后发优势”,首先必须有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环

境,保证资源最优配置。经济“洼地”应该抓住机遇,真正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大力培育市场主体,加快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把全面深化改革的成效体现在发展环境的改善上。“栽下梧桐树,自有凤凰来”,环境改善了,经济“洼地”也就会成为一片创业、兴业、成业的沃土、热土。

要充分发挥经济“洼地”的“后发优势”,关键是要突出特色,率先在关键产业、支柱产业、主导产业领域实现“弯道超车”。经济“洼地”应该把握中央精神,率先在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和所有制结构调整上取得突破,把科技创新作为产业升级的关键,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坚定不移淘汰落后产能,走具有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创造新的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

要充分发挥经济“洼地”的“后发优势”,就必须尽快提高人力素质,将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经济“洼地”必须从粗放式扶贫进入“精准扶贫”模式,要赋予贫困人口的内生脱贫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要切实将发展教育与吸引、留住

人才放在首位,不断增强自身的技术储备能力和技术增值能力,不再走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老路,充分发挥技术的后发优势。

要充分发挥经济“洼地”的“后发优势”,还必须要有底线意识,从而避免“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在坚持快速发展这一条底线的时候,经济“洼地”还必须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坚持环境保护与治理同步推进,坚持以人为本,根据实际、优化布局、传承文化,走出一条有特色、集约型、多样化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注重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

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证明,哪里解放思想、哪里敢于勇为人先的改革开放,哪里经济就能快速发展。要充分发挥经济“洼地”的“后发优势”,更应该在制度创新上取得突破,对中央已经明确了政策,没有障碍的要坚决落实,有障碍的要尽快清除;中央鼓励大胆探索的,提出了方向性试点的,要敢试、敢闯、敢干。以改革开放统领经济发展,是时代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呼声,更是成功实现“跨越发展”与“弯道超车”的关键所在。